

从布告到医典:一个读书人的抉择

1965年初春,武昌一座普通的宅院门前,贴出了一张布告。

不是官府文告,而是湖北省卫生厅派人书写,只为替院中那位七十四岁的老人谢绝求诊者。老人因长年积劳,已然卧床不起。

布告贴出去了,病人却没有散去。有人守在门外,有人隔墙喊话。老人听到动静,挣扎着坐起身,对家人说:“让他们进来吧。”家人劝他先养好身体,他摆摆手说:“病人来了,怎么能不看?”

他接诊、开方,一如往常,直至生命尽头。这位老人叫蒋玉伯。

再往前三十二年前,另一张“布告”贴在竹山县的城门上。那时蒋玉伯任县长,当地正闹瘟疫。他一边理政断案,一边给百姓看病,昼夜不歇。后来他把预防和治疗的处方抄成布告,贴在了城门上。

城门贴布告,向来是官府号令、征税纳粮。贴一张中药方子上去,大约是头一遭。

两张布告,一张贴在城门,一张贴在院门;一张主动示众,一张被迫谢客。一出一入之间,贯穿始终的,是一个中医人从不更改的本色——治病救人,来者不拒。

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更早的1891年。蒋玉伯,字成瑞,湖北枣阳人。其父蒋鹏程,为县粮行经纪人,兼做中医。家世虽不显赫,却使他自幼便常与账本、药方打交道。

1906年,他考进武昌普通中学堂。那是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新式学堂,既授经史,亦讲格致。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,学校停课,他回到枣阳,随父亲潜心学医。这场看似被迫的中断,反而让他得以在革命炮火中沉下心来,一头扎进《内经》《伤寒论》的世界。

1913年,他重返武昌,进了湖北法政专门学校。1916年毕业,1921年经友人介绍,到北京图书馆做编辑。那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,对他来说就是另一所大学。他白天编书,晚上读医书,手不释卷。那些年他一门心思扑在研读医书上,做了大量笔记,就此打下了深厚的医学理论功底。

1923年,他在北平考下中医开业执照,正式挂牌行医。直到1929年才迁回武昌行医。

多年后,他在《中国药理学集成》自序里写道:“余自束发读书,鉴于国医之衰微,即在志于斯道,每于课余之暇,辄读医书,不忍释手。”

由法政而中医,其间所历,不是一时冲动的改行,而是一个读书人在时代变局中,对自身道路的审慎选择。

1935年,上海国药研究社出版了蒋玉伯的《中国药理学集成》,其时作者四十四岁。这部三十五万字的著作,前后写了十余年,四易其稿。全书共引用古今中外医学著作及参考资料九十六种。书成之后,上海市国医公会负责人盛心如作序称赞:“一洗旧时流弊,可谓‘博而约,简而赅,浅而显,用而切,诚为将兵之韬略也……医者可备为肘后’。丁仲英、夏应堂、谢利恒等九位名医亦先后作序题跋,誉之为‘医学导师’‘国药指南’。《申报》专版介绍此书为‘国药科学化之巨著,国药界空前的杰作’。

作者在自序中写道:“吾国之药,始于神农本草……考各家所论药性,非简而寡要,即广博而庞杂,臆说附会,舛戾百端,或偏于五色脏,或杂用腐败秽物。既不明化学之原理,复不合卫生之主旨。”

这番话里既有对传统的尊重,也有对传统的批判。他不是一味崇古之人,亦非一味崇洋之輩。他看清了旧本草的问题——庞杂附会、缺乏科学规范;也看到了西医药物学的不足——药性割裂、失于平和。他所做的,正是将中医用药的智慧与近代科学的规范结合起来,让传统药理学在新时代站得住脚。

他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口号,只是用了十多年时间,老老实实地翻书、摘录、分类、求证、修改。下的是“笨功夫”,出的却是真学问。

从官场到学堂:一个教育家的担当

1935年秋,湖北国医专科学校迁到武昌涵三宫,蒋玉伯作为筹办人不仅亲自担任教务长,还兼任内科、药理学教授。彼时中医正面临西医冲击与政府歧视的双重困境,“废止中医案”余波未平。传统的“祖传师授”日渐式微,兴办学校、系统育才,成为一代中医人的共识。

蒋玉伯深刻地认识到:“一个国家,一种事业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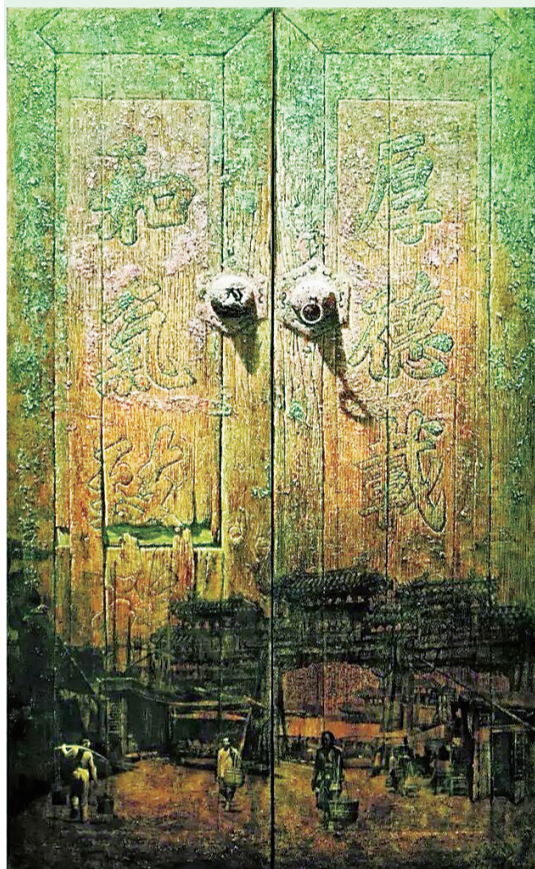


编者按:六十年前的春天,武昌一间旧宅门前贴出一张湖北省卫生厅派人书写的布告,请求求诊者莫再打扰一位病危的老人。老人却让人开了门——这位弃官行医、把药方贴在城门的湖北中医教育奠基人,一生践行“病人来了,怎么能不看”。今年是蒋玉伯先生逝世六十周年,特刊此文,回望一位医者的苍生情怀。

门里门外 皆是苍生

蒋玉伯先生的医者人生

冯春



厚德载福(油画) 王佩坤 作

兴旺,必须致力于人才的培养。”这个在法政学校和北京图书馆历练过的读书人,把现代教育理念带进了古老的中医教学。

他治校严抓严管,提倡艰苦创业的精神,常勉励学生:“要珍惜学习机会,学好本领,为继承和光大中医事业,为四万万同胞服务。”

当时办学经费十分紧张,他却依然重视校图书馆建设。据当年在校读书的夏幼舟老师回忆:“当时该校的医学著作齐全,参考资料丰富,可说是应有尽有。”

从1935年到抗战前夕,湖北国医专科学校一共办了五届,为湖北培养了数百名中医人才,还造就了王梧川、黄绳武、胡树人等一批现代中医名家。全国著名中医妇科专家黄绳武曾深情地说:“我之所以能在中医妇科学方面有所造诣,应感谢先师蒋老师的指点。”

严是外在的规矩,爱是内里的深情。蒋玉伯的“严”与“爱”,恰如他处方中的君臣佐使,相辅相成,缺一不可。

1939年12月,蒋玉伯激于民族义愤,随军行

医,其间还担任了半年第五战区军法官,后来先后担任均县、竹山县县长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,他选择走进官场,不是贪图仕途,而是为乱世中的百姓多做些事。可等他置身官场,才发现“当时军政官员相互倾轧,派系斗争激烈”,便在1941年7月毅然辞官,举家迁到郟阳,开中医诊所专心行医。他在竹山县县长任内,留下了最动人的事迹:当地瘟疫流行时,他“一边为官理政,一边为民治病”。

一个县长,白天升堂断案,晚上为百姓诊脉,这在今天恐怕很难想象。后来他根据疫情拟了双方,一方预防、一方治疗,让人抄成“布告”,张贴于城门。这大约是竹山城门上贴过的最温暖的一张“布告”。

他辞离竹山县时,送行者队伍长达一里多路。百姓送一个县长,不是因为他在任上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,而是因为他任上在瘟疫来临时没有躲开,在最艰难的时候与百姓站在一起。

他能和百姓结下这般情谊,说到底是因为他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。他看过的病人成千上万,有孙中山、董必武、王任重这样的重要人物,更多的是普通百姓,也有国际友人,他对谁都一样,真正做到了“普同一等”。

1925年孙中山病重时,蒋玉伯在《顺天时报》发表《对孙中山病状之研究》,文中写道:

“余告中医应诊者,宜考察精确,审慎处方,标本兼治,勿莽痛遣患,以误病者,而贬损中医之价值。”这番话里没有攀附名人的邀功之心,只有对医学本身的敬畏——无论病人是谁,医者都应当以同样的认真和审慎来对待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蒋玉伯迎来了教育事业的第二个春天。

1951年起,他先后担任武汉市卫生局中医考试委员会委员、武汉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、中南卫生部中医委员会委员、中央卫生部中央卫生研究院专门委员,还当选湖北省人大代表、省政协委员。凭借这些职务,他深度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湖北中医的制度化建设。

1960年9月,湖北中医学院成立,蒋玉伯被任命为副院长。从私立国医专科学校教务长,到新中国高等中医院校的副院长,蒋玉伯亲身参与了湖北中医教育从“医馆”到“学院”的制度化转型,始终站在人才培养的第一线。

担任校长期间,蒋玉伯已年逾花甲。除承担大量临床任务外,他仍经常深入学生之中,指导临床学习。他一生培养了成百上千名学生,这些学生承继了他为中医事业献身精神,传承发展着他的学术思想,在各自岗位上为中医事业作出了贡献。

从门里到门外:一个医者的苍生情怀

蒋玉伯曾为自己定下“出门看病,进门看书,治病救人,其乐无穷”的不渝之规。这是他的日常生活,也是他的人生哲学。直到逝世前不久,他还在孜孜不倦地读书,整理、撰写个人医案,以留给后人。

他在教学之余,还将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付诸笔端,先后编撰了《内科学讲义》和《妇科学讲义》,1956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,成为当时中医进修学校的重要教材。

1978年,他去世13年后,门人梁赐明将他的医案整理成《蒋玉伯医案》出版,共206页。那些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积累的笔记,那些在深夜灯下写下的病例,在他身后终于汇成了一本书。

一个人走了,他的书还有人读,他的方子还在使用,他的学生还在教新的学生。蒋玉伯不在了,但他所开创的教育事业和学术精神,依然在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人。

从1923年北平悬壶,到1965年武昌辞世,蒋玉伯行医42年。

若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他,大约还是他给自己定下的那条规矩——“出门看病,进门看书,治病救人,其乐无穷”。

这16个字里,没有轰轰烈烈,没有高深莫测。看病,看书,救人,乐在其中。一个中医人的日常,不过如此。

然而正是这样的日常,在四十二年中日复一日地持续着,才成就了一个医者的分量。

1965年初,院门上贴着那张劝病人止步的“布告”。风把纸角吹起来,病人还是推门进去了。院门里,一个老人抬起头来,看了一辈子病的眼睛依然平和、专注。

门里门外,皆是苍生。

看会儿书,果子就熟了

章铜胜

春天的花一一看过,树上的新叶也就绿得深浓一些了。缺少花开的日子,就不那么引人注意了。在春日连绵的雨季里,时光的流转是不易察觉的。雨意丰沛的阴雨天,日子凉凉湿湿,悄悄地就流走了。

天乍一晴,出门走在路上,阳光晃了晃眼,才感受到太阳有一股热辣的劲头,夏天忽然之间就来了。每年的春夏之交,总有一段长时间感觉到枯燥无聊,人懒得很,情绪恹恹的,不愿出门,只喜欢独自坐在室内,看看窗外的雨和雨中深浅的绿色,或是捧一杯新茶,随意地翻翻书。如此随意清闲,日子过得倒也不算无聊。悠然的日子通常是易于打发,过得也就快了。人到中年以后,怕日子过得太快。日子过得快了,仿佛那一年的时光是虚掷了的,什么也没有留下。其实,日子真的能给我们留下一些什么吗?或者说,我们认为它能留下一些什么呢?都不好说。

上个周末,天气不错。在鸟鸣声里醒来后,便到阳台上转转,清晨的空气真好,难怪鸟儿们叫得如此兴奋。太阳刚出来时,光线柔和明亮,没有急于要做的事,于是坐到书房的窗下,翻开书闲闲地看,真好。阳光在窗外晃晃的时候,决定到楼下走走。小区里的植物很多,经过十多年的生长,树已成荫,花也成簇了。阳光从树荫间斜射下来,有疏朗而又清

新的味道。在树荫下走,一抬头,发现枇杷已经熟了,觉得有些突然。“东园载酒西园醉,摘尽枇杷一树金”,是清晨刚读到的句子,而此刻,却看见那些浅黄的枇杷在深绿的叶间挂着,它们已经熟了。读到这句熟悉的诗时,并没有特别的感触,等看到枇杷黄了的时候,却多了一些惊喜。树上,一小串一小串的枇杷,仿佛是在我刚看了一会儿书的时间里,便熟了,忽然就觉得非常有趣。只是看了会儿书,枇杷就熟了吗?倒也未必,可我还是会喜欢这样的错觉。有时,错觉要比现实可爱得多。

有一年春天,从北京坐绿皮火车南下,特意选了靠近车窗的位置坐下,贴着车窗,听火车哐当哐当地响着,觉得很真实,仿佛又回到上学时坐火车的那种节奏,慢慢地,也不急着赶时间。窗外的风景慢慢地往后退,来得及看清,也来得及想一些与之相关的东西。边看风景,边想心事,也时不时地看会儿手中的书,这样的旅途是惬意的。火车到山东境内停在车站时,看到站台上有人在叫卖新鲜的樱桃。推着樱桃的篮子里,还插着几根碧绿的樱桃枝丫,一颗颗橙黄、绯红、深红、紫红的樱桃,如宝石般,有诱人的颜色。隔着车窗,买了点樱桃,放在面前小桌上的书旁,尝了尝,那如画的颜色之外,樱桃甜得诱人。仿佛只是看了会儿书,樱桃就熟了,熟

得那样惊艳。这些年,读的书越来越杂,书也是越来越放不下。哪天不读书,总感觉那天有一些事情没有做,心里有空落落的慌张。春天时,只是看了会儿书,花就次第开了。过了春天,也只是看了会儿书,那些果子就熟了。不只是枇杷和樱桃,还有桃子、杏子、李子、树莓等等。

早熟的桃子,是脆而清甜的,像是宋人的一首小词,清新得很,谁不喜欢淡淡的脆甜呢?杏子,毛茸茸的深黄上泛着红晕,可爱好看,味道甜中蕴酸,让人欲罢不能。吃着新熟的杏子,我总想起汉乐府,或是南北朝的民歌来,那也是甜酸相济的味道吧。李子的味道,不敢轻易去尝。我觉得它里面有某种隐而未发的东西,需要你去发现。而我不认为自己能找到它的秘密所在。

本来以为,只是看会儿书,果子就熟了。后来发觉,尝到新熟的果子,忽然就想起读过的一些句子、一些书,它们的味道有某种相似处,却又不尽相同。就像听到朋友聊到惠州时,我忽然就想到苏轼的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,想起饱满多汁的荔枝滋味。

看会儿书,果子真的就熟了——它在书中、在枝上熟了,别有一番滋味。

尼山谒圣

陆令寿

跨越千里山河,奔赴山东齐鲁大地。我们来自六个省份的老战友,如约相聚,一同走进尼山圣境。这一趟旅程,不只是分别多年的老兄弟重叙叙旧,更是走进圣人故乡,探寻华夏文脉、诚心致敬圣贤的一场朝圣之行。

回想几十年前,我们一起站岗执勤,同吃一锅饭菜,朝夕相处、并肩风雨,情谊实打实、沉甸甸。如今时隔半生,我们相聚尼山,站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,恍惚间仿佛又回到了热血军旅岁月。抛开了生活的琐碎和俗世的烦恼,只剩下老友重逢的踏实欢喜,简简单单、安然自在。

尼山圣境坐落在曲阜尼山脚下,这里是孔子的出生地,也是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的核心文化之地,承载着传承千年儒家文化的重任,底蕴深厚。走进圣境园区,最先映入眼帘的,是一尊72米高的孔子铜像,高高矗立,气势雄伟,看着格外庄严肃穆。

这座圣像的高度大有讲究,对应着孔子的72位贤徒,千百年来静静守护山河、传承文脉。圣人目光温和悠远,好似俯瞰着世间万物,将圣贤大道代代相传。圣像周围古木林立,苍劲的千年古柏郁郁葱葱,历经无数风雨冲刷,依旧枝干挺拔、傲然屹立,风骨不减当年。

我漫步在林间小道上,在十几棵长满树瘤的古柏前停下脚步,静静凝望,心生感慨。忍不住伸手轻轻触摸粗糙沧桑的树干,还有一个个凸起的树瘤,触感厚重质朴,每一处纹路、每一处凸起,都是岁月留下的印记。这些天然形成的树瘤,模样各不相同,浑然天成、妙趣横生。有的紧紧收拢,像含苞待放的花骨朵;有的高低起伏,好似大漠里行走的驼峰;有的圆润饱满,如同孕妇微微隆起的小腹。

一棵古树藏一段岁月,一枚树瘤藏一段时光。千年光阴层层沉淀在这些古木之上,风霜淬炼筋骨,岁月留下痕迹,默默积攒起中华文化之深厚底蕴,守护着这片孕育圣贤的灵秀土地,无声诉说着两千多年来生生不息的儒风雅韵。

在巍峨的圣像前,老友们合影留念。一张张熟悉的面孔、一张张真诚的笑脸,跨越数十年光阴,不变的是滚烫的情怀。

走到大学堂门口,我们没有立刻入内参观,大家顺着风雨走廊依次坐下,安静等候准备列队进馆。廊下清风徐徐,处处萦绕着儒雅气息。看着一位白发老友悠然闲坐,我索性提议,趁着这段空闲时间,一起重温儒家经典,感受圣贤风骨。

我把经典名句发到战友群里,主动领读。我读一句,大家便齐声跟读一句。这群年过七旬的老友,此刻抛开了半生的风霜阅历,放下了拘谨和矜持,像小时候读书一样,摇头晃脑、朗声诵读,神情天真又悠然,仿佛瞬间回到了年少寒窗、读书求知的时光。

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?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?”

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

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”

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

朗朗的诵读声回荡在长廊之中,和林间清风、苍劲古柏融为一体,浸润着尼山独有的斯文气韵。历经浮沉,如今再细细品读这些千古名句,只觉得字字通透、句句入心。这不仅重温经典,更是静心自省、涵养本心,也让我们接下来的参观之旅,多了几分虔诚。

等候结束,我们有序走进尼山圣境的核心建筑——大学堂。整座建筑融合了古典韵味与现代匠心,飞檐翘角、大气磅礴,内里更是藏着博大精深儒家文化。踏入堂内,古朴雅致的氛围扑面而来,雕梁画栋处处皆是礼乐风雅,长廊展陈满满都是圣贤智慧。厅堂布局规整,木质长桌整齐摆放,各类古籍静静陈列,浓郁的书香扑面而来,让人沉浸式走进绵延千年的文化长河。

在导游的安排下,我们这群两鬓斑白的老战友,干脆席地而坐。远离了外界的喧嚣纷扰,心境纯粹得像孩童一般。大家兴致勃勃拿起毛笔,俯身静心书写《论语》经典语句。不追求笔法标准,不讲究字迹好看,只遵从本心、随心书写、抒发心意。

写完后,每个人捧着自己的作品拍照留念,再小心翼翼地收好每一张带着墨香的纸页。字写得好不好不重要,笔触质朴,却是最真实的本心。每一幅简简单单的字,都是我们与千年圣贤的隔空对话,是暮年时光里一份干净纯粹的纪念。

站在巨型油画《孔子杏坛讲学》前,我心中感慨万千。画卷里,孔子端坐高台讲学,三千弟子围坐聆听,每个人神态各异、栩栩如生,还原了当年圣贤传道授业、教化世人的盛大场景。置身画前,仿佛穿越千年时光,亲眼见证了这场华夏文明的经典盛事。

来尼山圣境,礼乐大典《金声玉振》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重头戏。整场演出以儒家礼乐文化为核心,结合舞蹈、光影、诵读等多种形式,用唯美的艺术手法,演绎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源远流长。舞台上,庄重的冠弁礼,传承着中华千年礼仪;昂扬的射礼,尽显君子坦荡风骨;灵动的红袖飞天,伴着流转的光影,勾勒出独有的礼乐风华。

这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,让人在唯美诗意的氛围里,读懂儒家文化的包容与厚重,完成一场心灵的洗礼、精神的滋养。

我们大半辈子身穿军装、守护一方,到老了能结伴来到圣人故里,感受千年儒风,实在是难得的缘分。这片山、这些古树、句句圣贤箴言,还有老兄弟们在一起的欢声笑语,都让人心里特别踏实、舒服。

这次千里奔赴尼山,既圆了我们多年的相聚心愿,也让我们在书香古韵里沉下心来,洗净了浮躁。山河依旧,情谊长在,这次难得的尼山之行,看得尽兴、聚得暖心、悟得真切,是一趟不留遗憾、值得珍藏的美好旅程。